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八一期 ——
(二〇〇四年六月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406b)

【史海钩沉】毛泽东与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	唐少杰
【千秋功罪】毛泽东一生无敌手，最后却栽在周恩来身上	高文谦
【不堪回首】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感受	新风霞
【难忘岁月】江青是怎样折腾我拍“样板电影”的	严寄洲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xw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毛泽东与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

• 唐少杰 •

毛泽东与清华大学“文革”的关系是运动发动者和领导者与当代中国社会“细胞”互动关系的典型。正是由于毛泽东的直接作用，清华大学的典型性在全国无出其右。而清华大学“文革”中的突出事件及其非凡意义，也对毛泽东的“文革”策略和他所指导下的“文革”进程产生了直接影响，甚至导致了某些转折。

一 毛泽东批评工作组，扭转清华“文革”方向

1966年6月8日，一支由528人组成的全国最大的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宣布罢免上至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下到学生班主任、政治辅导员的几乎所有的清华干部，接管了清华的各级权力机构。刘少奇直接关心并过问清华的“文革”，其夫人王光美参加了清华工作组而具有显赫的作用。工作组以及“文革”对所谓走资派、“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人物的冲击不久被工作组与更加激进的学生群众之间的矛盾所超越。以工程化学系902班学生蒯大富为代表的激进群众同工作组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和对抗。工作组依据过去政治运动的模式，把蒯大富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并加以监禁多日，50多人被打成“蒯氏人物”，近500人

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发生数起自杀事件，致使两人死亡。

毛泽东1966年7月中旬回京，7月下旬对派工作组的做法大加斥责，并于7月底指示周恩来亲自过问和关注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1〕这明确显示出毛泽东本人对刘少奇及王光美在清华“文革”运动问题上的不满。毛泽东把自己与刘少奇等人在“文革”伊始之际一些做法上的不同，特别是把在清华等校工作组与激进群众关系上的分歧，上升到党内路线斗争的高度，上升到“文革”能否在全国范围按照毛泽东的旨意进行下去的大问题，并把他与刘少奇等人的分歧明确无疑地昭示给广大群众。难怪乎，“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头头在1966年9月就表示过，他们从8月就切身感觉到了，毛泽东让“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周恩来）代替“另一位常委”（指刘少奇）来过问清华文革的那耐人寻思的意味，因而，他们不难得出结论：刘少奇在“文革”问题上的做法有悖于毛泽东的主张或打算。8月下旬清华园内就有人贴出了批评刘少奇的大字报，而到了10月，更有人贴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

实际上，清华工作组问题是所谓以毛泽东为首的“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与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斗争的一个重大回合，从以清华少数激进学生反工作组为突破口，经过10月中央工作会议批判所谓“资反路线”，到12月25日中央“文革”小组授意和操纵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为主的5000多名师生员工进城大游行，把反刘少奇、邓小平的斗争公布于世，推向全社会，到1966年底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数次拒绝了清华红卫兵要求把王光美带回清华批判的要求〔2〕，再到1967年4月10日经“无产阶级司令部”同意，在清华召开数十万人参加的、旨在丑化刘少奇的批斗王光美大会，通过清华大学这一“前沿”，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文革”头十个月的分歧直至“分手”。

二 毛泽东与群众互动的典型个案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开启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文革”群众运动先河，但是清华反工作组的斗争最后却直指身居中共中央领导职位的刘少奇、邓小平。同时，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为发源地，“文革”有了一支为其席卷全国的突击队——红卫兵。

“文革”前夕的清华附中已孕育了红卫兵形成的因素，这主要表现在“培养革命接班人”这一带有“血统论”色彩的活动。1966年5月，该校预科班651班的一些学生因几件事情与校方发生分歧，争执不下，引起全校关注。5月29日，十余位高年级学生在圆明园遗址处讨论形势和商量对策，决定今后使用张承志曾用过的笔名“红卫兵”来署名所写的大字报。“红卫兵”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6月2日，他们贴出了有100多人在“红卫兵”名后签字的大字报，表示“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很快，北京许多所中学学生前来清华附中观看大字报，并以各自学校的“红卫兵”署名来表示声援。“红卫兵”这一名称不胫而走，迅速成为“文革”初期青年学生使用最早和最广的组织名称。

清华附中红卫兵为自己的初步“战果”而欢欣鼓舞，6月24日至7月27日先后写出了三篇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派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这三篇在“文革”初期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献，一经同年8月《红旗》杂志第11期以及《人民日报》等全文刊出，就成为以“造反”为真谛的红卫兵运动全线出击的进军号。前两篇大字报经江青转交毛泽东，毛泽东于8月1日亲笔复信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热烈的支持”红卫兵运动。这封信和上述大字报也成为当时正在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文件之一。由于来自毛泽东的首肯，红卫兵运动于8月下旬从校园冲向全社会。

红卫兵运动对于“文革”的作用主要有三点：一是它所造就的“红海洋”活动把对毛泽东

个人的崇拜和迷信推向了空前的高潮，为“文革”的全面推行提供了精神动力和信仰支柱；二是它所进行的“破四旧、立四新”的活动，为“文革”的全盘展开既创造了特定的社会氛围，又造就了最初的斗争模式；三是它所掀起的大串联活动给“文革”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的每一角落带来了群众运动的力量和途径。无疑，没有红卫兵运动，“文革”是难以有其浩大声势和全社会规模的。尽管毛泽东在1966年10月24、25日的中央会议上数次说：“我还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这么大的事。”〔3〕但是，红卫兵的产生及红卫兵运动的出现完全符合毛泽东从事“文革”的谋略和发动“文革”的动机，以红卫兵为代表的激进群众与毛泽东之间从下到上和从上到下的互动是“文革”得以进行的一个必然条件。

毛泽东否定了工作组的所作所为，也就意味着肯定了与工作组对立的激进群众的所作所为。一时间，曾受到工作组不同批评、压抑甚至打击的激进群众拥有了从毛泽东那里直接获得的“解放感”，从他们身上焕发出了毛泽东所期望的群众能量。在“文革”如何对待干部问题上，毛泽东比工作组走得更远，他使全国除军队以外的各个领域的干部“靠边站”，让文革以“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方式来进行，致使党的机构、组织以及国家行政管理机构，除中央一级和军队外，几乎全部陷于瘫痪。毛泽东的这一做法颇类似于17世纪初叶马丁·路德发起和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文革’是毛泽东的宗教和陷阱”，胡乔木言极是。〔4〕“文革”初期的毛泽东具有集神与世俗领袖、改革家于一身的耀眼的光彩。

另一方面，亿万群众对毛泽东的鼓动和号召也不是被动的、消极的。他们以自己超乎寻常的想象和行动创造出毛泽东本人未曾预料到的但又完全符合毛泽东本人的“文革”初衷和其政治斗争逻辑的“新生事物”。例如，在清华附中产生的“红卫兵”就是“文革”初期群众与毛泽东的互动中来自群众的一个首创。然而，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广大群众同毛泽东的互动愈益明显地展现出二者之间的偏差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背离。因为，十分明显，置身于“文革”洪流之中的广大群众来自广为不同的阶层，具有广为不同的利益，而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和“文革”实践不可能满足他们。这就决定了“文革”中群众与毛泽东的互动不可能完全整合。“文革”中，广大群众心中的毛泽东形象以及他们对毛泽东一系列指示、策略的理解和运用，广大群众对毛泽东权威的认同和遵从，尽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披上了神圣的甚至迷信的色彩，但决不是始终如一或没有差异的。正如经历了当年风雨的尤西林先生深刻地指出的：“仔细反省当时似乎无可怀疑的个人迷信狂热，其实却从不同的社会阶层利益为前提基础，众口一辞的‘毛主席’实质有着不同甚至对立的含义”。“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血统论压制的‘造反派’把毛泽东作为永生不背叛民众的革命家领袖，作为反抗特权阶层压迫的正义带头人”。而“有一种红卫兵对毛泽东的拥戴崇拜实质也以自身既得利益为立场。”〔5〕

在“文革”群众两派斗争的高潮时期，不同群众以及不同群众派别都会根据自己的目的和需要，把毛泽东的“文革”策略和“文革”权威加以夸大或加以淡化。1967年4月14日，清华造反派分裂为两大派别：一是“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团派”；另一是“井冈山兵团414总部”，简称“四派”。5月23日，在北京举行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大会主席台上，谢富治把他在22日见到毛泽东的有关情况绘声绘色地向邻座的蒯大富传达。谢讲，他向毛泽东讲了解决清华问题的三条途径：第一条让蒋南翔回来；第二条蒯大富和井冈山兵团总部下台，414上台。毛泽东说，这两条都不行。谢富治又说，第三条还是两派联合起来。毛泽东笑着说：“你又和稀泥”。蒯大富回校后多次在不同会议上逐字逐句传达，后经传播，团派一些群众把“414上台不行”当成“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欢天喜地地四处张贴、宣传。四派有关代表前去找蒯对证，蒯答应纠正，但实际上对此听之任之。四派最终与团派决裂，同讹传的毛泽东这一指示有一定关系。

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清华发生的“百日大武斗”，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逾1000万元。清华的“文革”

时局和发展，已到了非得由毛泽东本人直接过问和直接干预不可的地步了。7月27日，工宣队进入清华。在7月28日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中，毛泽东多次言不由衷地说：“十万工人进清华，四一四高兴，井冈山不高兴，我也不高兴”。他还说：“井冈山小将一个不能抓，一个不能打”。“抓了七个总部委员，一律放掉”。尽管毛泽东不愿意看到清华“文革”出现了百日大武斗这样的情况，但是他决定派遣数万名工人组成宣传队进驻清华时，他是否想到进驻时的结局？他是否意料到清华团派会以武力对抗工宣队而造成如此之大的牺牲和损失呢？或者，他是否已充分预想和充分估计到了以扭转清华“文革”形势为契机而要使他领导的“文革”发生转折呢？7月28日凌晨两点许，刚刚入睡不久的毛泽东被周恩来汇报的电话叫醒，当毛泽东听到27日工宣队在清华牺牲惨重的消息时，他的第一个反应是“造反派，真的反了？！”（6）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在“文革”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这次召见是他与大学里的造反派群众之关系的一次重整。尽管我们至今还不清楚此次谈话的全部内容，但根据正式公布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7），可以看出：（1）以清华“百日大武斗”特别是“七·二七事件”为契机，毛泽东对红卫兵领袖的严厉批评表明：毛泽东对群众运动及造反派失去信心，对造反派领袖及红卫兵领袖已不抱多大希望。他似乎开始告别他过去屡试屡爽的群众运动模式。毛泽东在1968年之后实际上已不再“启用”群众运动了，他再也不想使群众运动从自己手中“失控”。1968年之后出现的一些“文革”群众运动的东西，不过是“文革”头两三年群众运动的回声或遗迹。（2）毛泽东决心，在北京地区和全国结束群众武斗，为达到此目的，他酝酿淘汰“文革”初期效过犬马之劳的红卫兵领袖，甚至威胁说，不惜动用正规军武力来结束群众武斗。毛泽东的这次召见谈话可以看做是对“文革”群众武斗的“最后通牒”。毛泽东不但被全国性的群众武斗所困扰、烦恼，而且还被这种武斗弄得穷于应付。（3）毛泽东似乎对北京高校的群众派别分成“天派、地派”十分不理解，他希望两派搞成一派，而“文革”群众之所以分成两派恰恰是沿着毛泽东的“文革”策略演化而来的。毛泽东在这里已“超脱”了两派对立的实际问题，他已逐步开始把群众问题从他的“文革”全局战略加以淡化。（4）毛泽东对群众武斗所带来的教育界“文革”如何搞下去的问题也是力不从心。他提出教育如何搞下去的四个办法，表明他开始置换教育界“文革”的主角，至少表明他开始考虑把学校现有的青年学生从整体上列入“文革”中接受“再教育”的对象。这一点在他8月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中得到了体现。（5）毛泽东明确告知红卫兵领袖们，派遣工宣队是他的决定，不容怀疑、否定，更不容抵抗。在召见之后，蒯大富在很小的范围内传达，毛泽东讲：“蒯大富不是要抓黑手吗？这个黑手就是我，他也不来抓。”这对团派以武力对抗工宣队进驻清华来说不啻是致命的评判。毛泽东决定派遣工宣队进驻高等院校，在他看来，根本没有事先“通知”造反派的必要，也根本没有对此“讨论”的余地。正是这次召见中，毛泽东下令，为了防止红卫兵领袖及其相关的群众像以前那样篡改、曲解或片面引用他的指示，把这次召见的谈话进行录音备案。毛泽东对红卫兵领袖及其麾下的群众不信任感，由此可见一斑。（6）一贯最善于揣摩毛泽东的林彪在这次召见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红卫兵领袖的“错误”：“你们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8）红卫兵领袖们的“落伍”意味着造反派群众的“落伍”，意味着红卫兵运动的衰落。“文革”即将转入一个新的阶段已不可避免。

毛泽东对清华“百日大武斗”的处置引发了“文革”历史的重大转折，这一点在8月以及之后进一步显现和确定下来。在对8月25日发表以姚文元署名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的批阅中，毛泽东已明确把“文革”初期造反派群众及红卫兵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从整体上列入“文革”的对象，他绝不允许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搞什么“独立王国”，绝不容忍高等院校的造反派们搞所谓“多中心论”。毛泽东派出工宣队进驻教育界、文化艺术界、出版界、科研机构等，不仅没有解决这些领域的“文革”矛盾和危机，而且使这些矛盾和危机更加复杂和深重。从1968年底开始，当年曾为“文革”开路小将的一代青年激进学生奔赴农村、农场，在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在此意义上，清华“百日大武斗”敲响了红卫兵造反运动的丧钟！

三 工宣队：“文革”群众组织消解的标志

初看起来，毛泽东派工宣队与刘少奇等派工作组有着惊人的相似，即在形式上都是从上层、从外部来领导某一单位（或部门）的“文革”，都是力图对“文革”的群众运动加以有序而又有效的管理或制约。但是，二者却有内容或本质上的差别。刘少奇等派出的工作组是突出以往行之有效的党的上级垂直领导的传统，旨在把“文革”群众运动纳入党所指定的轨道运行。毛泽东派出工宣队，则是他对他难以驾驭并且很有可能势大失控的群众运动的无奈，也是他对他曾借此发动、依此成势的“文革”群众运动政策的自我否定。派出工宣队恰恰是在“文革”进入了一个危机性的关头，由毛泽东所做出的一个转折性的决策而表现出他本人被动地应付群众运动所造成的群众武斗局势，表明了毛泽东在他与群众的互动中不可能是完全自主的。毛泽东派出工宣队的做法直接动摇以至逐渐消蚀了作为“文革”初期主力和支柱的群众运动及造反派的基础，使得“文革”的中、后期游离了“文革”初期的群众运动主题或主线。工作组在清华等校只驻了五十余天，工宣队一驻就是七八年。工宣队的问题直至“文革”结束才告结束，使得清华大学乃至整个教育领域大伤元气。

工宣队进驻清华，给清华“文革”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这使1968年7月之后的清华“文革”类似于工作组时期那样，已不是由清华人自己所能摆布的。来自毛泽东身边的中共中央警卫部队（8341）的军代表充当工宣队的领导人，他们的特殊身份和特殊使命已很难表明他们是工人阶级的普通一员了。他们常常强调自己是“毛主席派来的兵”，“清华大学是毛主席的点”，着重显示出毛泽东对清华大学的特别关注以及清华大学非同一般的地位和角色。在1968年开始的“斗、批、改”阶段和1973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都把清华大学的若干经验作为典型，昭示全国。例如，毛泽东把工宣队炮制的《清华大学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报告》转发给全国，并把它作为所谓“六厂二校”经验之一，树立为“斗、批、改”的一个典型，通过给清华老教授的一定“关注”稍许缓解全国许多老知识分子的苦境。例如，他同意清华工宣队提出的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刘仙洲、钱伟长“给出路”的建议，并把这一“经验”批转全国。

四 清华大学成为文革“教育革命”的基地

1969年春季之后，毛泽东的“文革”战略发生重大的转移，逐步恢复“文革”中被冲击和削弱的党政领导及其权威，以取代过去两年多混乱无序的群众运动。标志之一就是毛泽东指名“保护”蒋南翔这位教育界被“文革”打倒的“最大对象”。在1970年8月22日下午举行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前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说：“对蒋南翔这样的人留下来好。”〔9〕当时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之所以未能付诸实施，是因为尚处在“劳动改造”中的蒋南翔对清华工宣队炮制的《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一文表示不满，在发表此文的刊物上，理直气壮地写下了批评意见并送交给工宣队，这使他的所谓“被解放出来”拖延数年。

《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一文是工宣队进校近两年工作的总结概括。此文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并在《人民日报》、《红旗》等报刊上发表，成为“文革”高等院校“教育革命”理论和实践的范文。

清华的“教育革命”体制始于1970年，完全符合毛泽东50年代以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举措，它包括六个方面：一是所谓工人阶级必须掌握“教育革命”乃至学校一切工作的领导权。在清华长期出现了工宣队与校党委、校革委会并列掌权及并列署名行文的局面；二是对原有教师边改造、边使用，建立以工人、学员和原有教师三结合的教师队伍；三是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所谓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实际上大大削弱了基础

教学，阻碍了科研，而一味片面从事生产；四是招收有一定的社会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人员为学员，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使他们“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工农兵学员与工宣队一起成为学校的主体，而广大教师则动辄得咎，成为“教育革命”改造的对象；五是大破所谓买办哲学、爬行主义，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这种教材往往是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传单式的东西；六是结合生产、科研任务，坚持群众路线，实行新的教学方法。而这种方法往往不过是“文革”大批判的变种。

“教育革命”是毛泽东“文革”理论中时间最久、范围最广和规模最大的乌托邦实践，清华大学成为这一乌托邦实践的主要基地。证明：“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是一场反知识、反科学、反理性、反现代化的运动。它以打乱正常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秩序、整治知识分子、制造师生关系对立等为其主要内容，它几乎是伴随着“文革”的破产而破产。

1973年10月，为了配合和指导批林批孔运动，在毛泽东的部署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判组逐步形成，这一在“文革”中以“梁效”而著称的批判组实际上是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别动队。据当事人回忆：“‘梁效’应是毛泽东通过谢静宜、迟群掌握的写作班子。毛泽东直接向谢静宜下达指示和要求，然后再由谢和迟向‘梁效’头头转达、贯彻。‘梁效’所宣扬、倡导的是毛泽东的理论和思想。”〔10〕在“梁效”先后的40余名成员中，清华人员只占10名，这与清华是一所工科大学有关。至1976年10月，“梁效”共发表了181篇文章，它们对当时“文革”的动态和走向起到了全局性的影响和指导性的作用。“梁效”是毛泽东与大学特定教师群体合作从事思想指导和理论斗争的产物，它成为“文革”特殊形势下独一无二的准意识形态“领导”部门。

五 刘冰等人的信敲响了“文革”的丧钟

“文革”进入到1975年，邓小平开始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领导工作，他对“文革”的积年弊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这一背景下，一场关系到否定还是肯定、抛弃还是坚持“文革”的斗争也在悄然进行。1975年8月和10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柳一安、惠宪钧和政治部主任吕方正四人写信给毛泽东一事，拉开了这场斗争的帷幕。

刘冰是工宣队进校后所谓解放出来最早并重新担任原职的清华干部，另三位写信者则是1968年来清华的工宣队负责人。他们一致厌恶迟群这位当时清华第一把手兼“通天人物”的跋扈作风和恶劣品质，他们写信的目的在于把迟群从清华“搬掉”。他们明确地认识到此事只有通过毛泽东的首肯方可实现，他们也真切地意识到写给毛泽东的信惟有通过邓小平的转交方可达到。他们写给毛泽东的第一封信旨在抨击迟群，第二封信则把迟群和时为清华第二把手的谢静宜连在一起加以抨击。从这两封信里，丝毫看不出有反对毛泽东或不满意毛泽东的迹象。〔11〕

愈是接近生命尽头的毛泽东愈是担心他自己生平两件大事之一的“文革”在他身后的命运。面对邓小平的整顿形势以及邓小平与“四人帮”的斗争，毛泽东相信了“四人帮”及他的联络员的谰言，再加上邓小平明智地拒绝了毛泽东提出的由邓小平本人来主持起草一个关于“文革”的决议文件的要求，毛泽东决定开展“批邓”的斗争。

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指示”只标明了月份，没有标明日期，并且最早是在1975年11月3日下午有53人参加的清华党委扩大会上作了部分传达（批评邓小平的那一段“指示”暂未传达），后在11月18日才向清华万余名师生（北京大学有1600人参加会议）作了全文传达。毛泽东把刘冰等人的来信看成是矛头对着他本人的，他非常不满意邓小平转交这两封信，认为邓小平偏袒刘冰等人。类似于以往毛泽东看待清华出现的问题决不限于清华一

样，毛泽东把刘冰等人写信一事说成“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直至次年4月，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毛泽东都认为是“刘冰惹的祸”。〔12〕

从1975年11月中旬开始，刘冰等人写信一事演变为“教育革命大辩论”。一个月后，又演变为全国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被迟群等人所把持的清华大学处于“文革”最后一场运动的风口浪尖，一时间，全国许多地区和单位或部门数十万人先后涌入清华大学观看大字报，进行所谓学习、参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机关上千名领导干部也被安排来清华“学习”。清华几乎停止了正常的教学工作，专门从事所谓“批邓”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先后贴出了数十万份大字报。在十个月的时间里，刘冰等人先后被批斗达上百次，其中刘冰本人被批斗达214次。〔13〕从清华园滥殇的“批邓”斗争，并没有使“文革”取得决战性的最后胜利，而是更加凸显出一个严峻的问题：毛泽东身后的“文革”将何去何从？

实际上，由清华“教育革命大辩论”所带来的“文革”最后一场运动恰恰表明了“文革”已走入了历史的死胡同。1976年发生的“四五事件”证实了这一点。同年10月，在毛泽东去世后不到28天，“四人帮”被一举粉碎，迟群等人在“四人帮”被擒不到两小时就被一网扫尽，清华大学乃至整个中国从此获得了新生。在此意义上，刘冰等人写信事件意味着敲响了“文革”走向穷途末路的丧钟。

注释：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3〕《学习资料》（四）清华大学印，1967年。

〔4〕转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5〕尤西林《文革境况片断》，载徐友渔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

〔6〕转引自《共和国历程》中卷，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

〔7〕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此材料是由谢富治在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之后，留下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整理出来的。可能还有另一份关于此次召见的书面整理稿，至今没有公布。

〔8〕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

〔9〕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

〔10〕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明镜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

〔11〕余习广编《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12〕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13〕《清华大学》报，1978年10月28日。

□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
~~~~~

【千秋功罪】

毛泽东一生无敌手，最后却栽在周恩来身上

• 高文谦 •

《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2003年11月11日应邀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发表演讲并回答了学者们的提问，由多维社记者记录整理如下：

## ◇ “谋事在毛，成事在周”

高文谦：文革十年中的毛泽东周恩来关系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所写的《晚年周恩来》一书实际上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对此有详尽的叙述，披露了大量的史料。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无法充分展开，只能勾画出一个大体轮廓，提出其中的一些要点，以期抛砖引玉，引起人们对文革浩劫的反思。

毛周关系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他们两人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合作，影响深远，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可以说是“谋事在毛，成事在周”。毛周之间这种共生和互补的合作关系，无论是在中共马上打天下，还是马下治天下，都是这样。中共的老对手蒋介石对此就深有感受。当年国共两党争夺天下时，蒋介石曾经慨叹过，国民党里面就没有像周恩来这样的人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毛周合作的分量。可以说，中共当年之所以能够打下红色江山，乃至后来文革天下大乱没有彻底崩溃，在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这一点。

值得一提的是，毛周这种合作模式至今仍为奉行“一个核心”体制的中共官方所推崇，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领袖结构模式。因此在考虑领导核心班子的搭配时，自觉不自觉地仿效这种模式。无论是邓时代，江时代，还是现在的胡温体制，都可以看到这种模式的影子。这一点，提请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加以注意。

毛周关系说到底是一种现代君臣关系，尽管外面披着一层马列学说的外衣，但骨子里却是共产专制下党魁独裁和党徒臣服的关系。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年皇权专制统治历史的国家。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皇权专制主义。这种政治文化和民族心理年深日久，根深蒂固。毛的帝王思想和周的忠君心态，都是这种民族文化传统和心理的反应。

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毛的专制、独裁和周的忠顺、驯服就反映了这种一体两面的东西。中国人这种敬畏权威，甘愿做奴隶的心态深入骨髓，溶化在血液中。实际上就是鲁迅笔下的阿Q相。周可以说就是这种臣民心态的代表人物。王若望生前曾经讲过，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我要补充一点的是，每个人心中还有个周恩来。周在权力场中的种种表现和人格的扭曲，虽说有某种不得已之处，却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在评周时，需要对周的这种臣民心态进行理性的批判，清除这种国民的劣根性，否则今后中国无法建设成一个人格健全的公民社会。

文革十年中，毛周关系是发动者和执行者的关系。毛是文革的始作俑者，周一直是毛的合作者和追随者，贯穿于文革的整个过程。从文革的发动，到天下大乱，到林彪事件后收拾败局，都是这样。在文革期间，毛周关系尽管是跌宕起伏，时紧时缓，但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周一直是处于核心圈中的人物，贯彻执行毛发动文革的意图，与中央文革的角色有分有合。具体来说，自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周取代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后来又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九大后继续主持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一直到他病重。

在发动文革的格局中，毛所采取的策略是：联林，拉周，倒刘，整邓。周一直是毛拉拢和争取的对象。毛对周始终是一种矛盾的心态，既需要依靠周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但另一方面又不给与充分信任，始终戒备提防，怀疑周在政治上有二心，越到后来，毛对周的猜忌心越重，周的日子也越不好过。

周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和毛的为人。中国老话说，伴君如伴虎。周一直用侍君之道来处理



和毛的关系，凡事总是臣罪当诛，天皇圣明。对毛的胡作非为，他也总是恪守君臣之道，君可以不君，臣不能不臣。周有三句话，形容自己在位时的心情：戒慎恐惧，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实际上，周的一生都笼罩在毛的阴影之下。《晚年周恩来》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表现了这一点。

在文革中，周对毛采取顺守之道，从不硬顶，极力隐忍，小心周旋，一遇批评，立刻检讨，用“太极软功”来化解毛对他的不满和猜忌。可以说，周是中共检讨文化的集大成者。他一生中检讨无数，屡屡化险为夷。而且令人称奇的是，周的威信不仅不因检讨而降低，反而上升。他是中共领导人中检讨最多，也最善于检讨的一个。这是他成为中共官场上不倒翁的要诀。在凶险的党内斗争中，周是唯一能够与毛共始终的人物。

在文革中，周把忠于毛，保持自己的晚节作为最重要的政治操守。一事当前，周总是先要跟着毛走，不管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是非对错如何，在政治上总要顺从毛的意志，贯彻执行毛的意图；然后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对毛的思想“隐恶扬善”，有所发挥，有所保留和补救。与此同时，周又小心翼翼地与毛保持一段距离，以毛的容忍为限度。这种距离视具体情势随时调整。

周在文革中竭力紧跟毛，但两人的政治理念并不相同。毛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用政治运动统领全局。周则比较务实，更注重国计民生，主张以经济建设为本。这一点决定了周在文革中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努力贯彻毛发动文革的意图，另一方面设法维持社会生活的运转。善于在政治上走钢丝的周使出了浑身解数，调和两者之间的内在矛盾，找到其中的某种平衡点，尽可能把两者统一起来。恪守中庸之道，执两用中，是周一贯的为政和做人之道。

文革中的毛周关系，大体可以林彪事件划线，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林彪事件前，包括文革发动初期和天下大乱时，毛对周虽然也常常不满，时有批评，但总的来说，是以拉拢和依靠为主。林彪事件之后，毛虽然仍然需要依靠周来管理国家，但是更多的是戒备提防，敲打整治。像邓小平的复出，国内外一般都认为是周在幕后推动的结果，实际上并非如此。邓的复出是毛在林彪事件之后，看到周在党内外的声望越来越高，在政治上难以控制，所以重新起用邓来箝制周。另外在周治病问题上，毛也做了手脚。还有1973年底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随后的批林批孔运动，都是整治周的。

◇ 毛是不让周做手术是出于好意还是恶意？

提问：能不能把毛在周治病的问题上如何做手脚这件事谈的详细些？

高文谦：周是在1972年5月一次例行的身体检查中，发现小便中有几个不规则的细胞。经过北京、上海、天津的专家们的会诊，确诊是膀胱癌。膀胱癌的特点是治疗的时机非常重要。如果早期发现，及时治疗，治愈率很高；反之如果错过时机，只有死路一条。医疗组非常清楚这种后果，马上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周的病变尚在早期，建议尽快做手术。

按照中共的保健制度，政治局以上的领导人作手术，要经过毛的批准。毛通过汪东兴向医疗组传达了四条指示：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不要检查，不做手术，注意加强营养和护理。医疗组的专家们对此很不理解，向上反映。汪东兴让他们“稳住”，说这件事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虑全局的问题，可过一段时候再说。于是这个事情就拖了下来。

就这样，一直拖了整整九个月，到1973年2月，周有一天早晨上厕所，突然排出大量鲜红色的血尿，把整个马桶的水都染红了。这个事情再也隐瞒不下去了，医疗组和周的警卫向上反映，需要尽快做检查治疗。但是遭到了汪东兴的训斥，他又把毛搬出来，说要听主席的，

七老八十了，做什么检查，不要慌么！最后还是叶剑英利用陪同毛见外宾的机会，拿着带血尿的瓶子给毛看，毛这才决定让周去检查。

但是即便在这时，毛仍下指示说，只准检查，不许做手术。1973年3月，周才住进玉泉山做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医疗组的专家们暗中抗命，在给周做膀胱镜检查时，悄悄地把癌变部分烧掉了。虽然如此，已经失去了最有利的治疗时机。在后来两年多的治疗过程中，周受了很大的罪，但已经无可挽回。我在北京时曾经采访过吴阶平，他是周的医疗组组长。他说膀胱癌这种病非常顽固，反复发作，我们下面很着急，但是没有办法。

提问：据我所知，毛本人是反对手术治疗的，他不让周做手术，是出于好意还是恶意？

高文谦：对毛是否在周治病上做手脚的问题，其他人也提出过这样的疑问。的确，毛本人不相信西方医学，他认为大夫是没有用的，大病治不了，不是大病也不需要去找大夫。不过，毛自己不相信医生是一回事，不让周动手术是另一回事。毛对周治病的四条指示，应该放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来看。林彪事件后，毛因为文革破产而灰溜溜的，周在内政外交上的威望上升，特别是提出批极左思潮，落实各项政策，在党内外大得人心。这让毛戒心大起。

在周治病的问题上，毛是有他的考虑的，很难说毛的四条指示是出于好意。就说毛自己不懂医，也不信医，可是医疗专家给中央的报告已经把周的病情和后果讲得很清楚。再说毛不让做手术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准告诉周本人，甚至连检查都不让，整整拖了九个月，一点医疗措施都没有，这能说是好意吗？后来实在瞒不下去了，毛同意给周做膀胱镜检查的同时，又下令不准烧掉病变部分，又怎样解释呢？实际上，如果不是医疗组暗中抗命，周大概连两年也活不了。周的家人为此非常感激医疗组。应该说，毛在周治病问题上的真正意图，可以从前面说过的汪东兴和医疗组的谈话中，看出其中的奥妙，那就是“主席正在考虑全局问题”。什么是“全局问题”呢？放在林彪事件的背景中来看，一目了然。

#### ◇ “批林批孔批周公”的由来

提问：请你谈一谈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的问题。

高文谦：关于1973年底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来龙去脉，这是我在书中第一次详细披露出来的。这次会议的导火索是基辛格第五次访华。周被毛抓住了“辫子”。毛说周没有请示就擅自向基辛格做了中美进行军事合作的承诺。毛下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会议中给周戴了很多帽子，危言耸听，其中最极端的话是毛说周想当苏联人的儿皇帝，说他怕苏联人怕得要死，如果苏联打到中国来，就跑到美国的核保护伞下。按照毛的定下的调子，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了半个多月，批周外交上的投降主义，卖国主义。这是周晚年经受的最大灾难。

在基辛格来访前，周已经出现了尿血，本来应该去做治疗，却因为政治局扩大会议而停止下来。会议期间，周受到极大的精神压力，最后只好按照毛定下的调子，全部接受会上给他戴的帽子，在检讨中给自己上纲上线。会议后期周的病情明显加重。我曾经采访过章含之，她列席了这次会议，亲眼看到周不时地上厕所，在里面很长时间，半个小时出不来。据周身边医务人员讲，周膀胱里面出血，形成血块，把尿道堵住，每次小便非常痛苦。后来，毛下令停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一个月后又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把批周的问题捅向社会。

这便是所谓“批林批孔批周公”的由来。毛周关系的终结。毛的一生打败天下无敌手，斗倒了党内外所有政敌，最后却栽在生前一向对他俯首帖耳的周身上。周恩来之死引起中国社会危机的爆发，引发四五运动，矛头直指党内文革派和后台老板毛泽东，敲响了文革的丧钟。毛

死后，江青一班人旋即被抓起来，毛的文革理论也被中共官方放弃，周的“四个现代化”成为中国官方治国的指导思想。

◇ 周恩来到底有没有遗嘱？

提问：请介绍一下你书中的史料来源的问题。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这本书主要依据历史文献档案，其中包括中央文件汇集、资料选编、文电、批示、报告、书信、笔记、讲话、会谈、会议记录等。此外是对一些重要当事人的访问纪录，其中既有和他人一道的集体采访，也有我个人的单独采访和私下交谈，如采访吴法宪、杨成武、纪登奎等人，还有就是选用了一些当事人、亲历者与学界同仁发表在报刊上的回忆和研究文章。

顺便谈一下中国大陆目前的档案管理制度。大陆的档案管理制度一直是非常严格的，历史档案不是为了研究和利用，而是为了保管和保密，特别是涉及到中共领导人的更是严格控制。大陆目前有三大档案管理系统。一是中央档案馆，负责管理中共领导人和中央党政各部门的档案。其中包括中共在建国前的文电档案。这是最大的一个。另一个是南京第二档案馆，主要管理国民党政府和日伪时期的档案。还有就是军委档案馆，自成系统，主要保管军队工作和军史方面的文电档案，由军委办公厅领导。此外，各省市还有自己的档案馆，实行双重领导，一方面在业务上归中央档案馆指导，同时也受地方党政部门领导。

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日常处理的文电，以及由此形成的档案，首先是由中办秘书局存档保管，中央党政各部委的则由自己来存档保管。据我所知，大约十年之后移交给中央档案馆。大陆至今仍然没有一个档案公布制度。主管中共党史的胡乔木曾经考虑要搞一个规定，建立三十年档案解密制度，但是在六四之后就不再提了，而且比以前更加从严控制，把很多原来保存在个人手中的档案收了回来。

我以前工作过的中央文献研究室，是负责编辑出版中共领袖的著作、传记、年谱的官方机构。中央档案馆对其还比较开放，一般来说还能够尽量满足研究工作的需要。不过在单位内部，档案的管理制度还是很严格的，有诸多限制，严格按照级别、专题研究来阅读。比如刚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只能接触一般的档案。处一级或者副研究员就可以多看一些，级别越高，能够阅读的范围就越大。

所谓档案的保密等级，实际上是以涉及中共领袖人物的负面形象来划分的，比如党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彼此之间的相互批评等，都是属于高密级的档案，不能扩散。文革期间的档案更是如此。当年在文献室时，我是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后来担任室务委员，又是文革编辑组的负责人，所以看档案比别人多一些，但也不是什么都可以看到。很多档案需要专门打报告，经过上面批准后才能看到。不过，我还是利用上面交办任务的机会，接触了不少核心档案，其中有不少是专门写了请示报告，上面特批后才看到的。

提问：周恩来到底有没有遗嘱？有材料说叶剑英问周恩来有什么话要说，周说权力不能落到四人帮手里。这是否暗示叶在毛死后要对四人帮有所动作？

高文谦：我清楚周在病重时对叶说这番话的经过，实际上是我当年给官方编写《周恩来年谱》时加上上去的一个条目。出处是叶剑英传记组的材料，不过是孤证，没有其他材料可以旁证，也无法判断具体时间，不知是临终时说的话，还是在之前四届人大组阁之斗时说的。我所知道的是，叶是在周病重的时候去医院看望周次数最多的一个，远远超过邓小平等其他人士。而且叶交

待周身边的警卫秘书要做记录，说周在最后时候一定有很多话，心里有很多委屈，他说什么话你们一定要记下来。但是，最后警卫交给叶剑英的仍是一张白纸。

至于周是否有遗嘱，我觉得不大可能。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周对自己多年的老伴邓颖超都不能说心里话，很多话只能埋在心里。邓在周病重的时候每天陪着他，两个人经常握着手，相对无言。我在书中写了周晚年悲苦的心境，是伤而不怨，尽管对毛发动文革有看法，但要保持“晚节”，恪守忠君（毛）之道，绝不吐露出来，更不用说抓四人帮这种举动了。

不久前，网上流传陈永贵的访谈录，题目是“我梦见了毛主席”。其中所披露的和我所了解的情况有相合之处。陈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参加政治局会议，亲耳听到叶剑英介绍抓四人帮的整个过程。叶说，当时周病重后，党内有很多人来找他，提出要采取行动抓四人帮。叶认为事关重大，投鼠忌器，毛还在，只有争取周的支持，才能考虑这个问题。为此，叶试探过周的口气，周说还是要相信毛主席，要听主席的话。据叶讲，周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

◇ 毛泽东为什么怕周恩来对他有二心？

提问：周去世时，北京有上百万人送葬，人民对于周恩来的感情是难以置信的。许多人认为周恩来是非常值得尊敬的，这是由于他在文革中的政绩，还是因为有人把文革当中周不满毛的所作所为透露给人民大众？

高文谦：北京百万市民在街头送别周的灵车，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原因非常复杂。导火索是毛压制老百姓自发悼念周的活动，不许报道，不让各单位设置灵堂悼念周。粉碎四人帮后，官方把责任都推到主管新闻宣传工作的姚文元身上，说这是四人帮搞的。但实际上毛才是幕后主使。毛说不要用死人压活人，自己也拒绝参加周的追悼会，还闹出了“鞭炮事件”。一般老百姓也许不了解情况，但是了解内情的党内军中的老干部都愤愤不平，认为周一生对毛忠心耿耿，毛却这样对待周，太说不过去了。

这种不满情绪很快便扩散到整个社会。人们本来就对搞了十年之久的文革运动已经厌倦了，对毛批邓的决定，更是想不通，对江青为首的文革派恨之入骨。当时人们不完全清楚周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但有某种直觉，周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毛的极端思想和四人帮的横行霸道的牵制，而且觉察到毛对周的不公。在这种情况下，悼周便成为凝聚社会力量，宣泄种种不满和失望的一面旗帜，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四五运动，为中共党内的温和派在毛死后抓四人帮，提供了民意基础。

提问：毛到底为什么怕周对他有二心？

高文谦：毛为人猜忌，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任何人，林彪事件后，更是变本加厉，疑神疑鬼。毛认为自己一生办了两件大事，一是打败了蒋介石，二是发动了文革。林彪事件实际上宣告了文革的破产，弄得毛灰头土脸。如果说毛发动文革是担心党内有人像赫鲁晓夫一样在他身后做秘密报告的话，那么在林彪事件后，毛的这种担心就更加强烈，唯恐有人在他死后翻文革的案。当时，他认定周是党内为文革翻案的挂帅人物。这是因为周在文革中的态度暧昧，一直小心翼翼地与毛保持一段距离；另一方面则因为周在林彪事件后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而且掌握实权，打着批林的幌子，提出批极左思潮，落实政策，对文革有所纠偏。周的这些举动，在党内外大得人心。这是毛对周不能放心的地方。正因为如此，周在林彪事件后，大祸临头，日子很不好过。

~~~~~

【不堪回首】

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感受

• 新风霞 •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被关押、坐单位的牢是“文化大革命”中很普遍的事，也叫“进牛棚”，更严重的是关进监狱。我和祖光很幸运，没进监狱。我们单位从1966年8月26日开始“打全堂”，北京市各个机关单位都打人，我们中国评剧院是打人的典型。开始关押人，把全单位的走资派及所谓牛鬼蛇神关进“狗窝”了。把装煤的房子腾出来，用木板钉住门，下面留出空隙，人必须爬进爬出，地上只垫些草。我们要随时挨批斗挨打，外单位的人也随便进来看大字报，批斗打人，这叫“革命走向社会”。同是被批斗审讯的人，也是一伙一帮的。领导干部自然形成了一伙，他们相互关心帮助。我们演员一伙，我和小白玉霜、魏荣元等人一起挨批斗，吃饭自然也都在一块，劳动也被分配在一块。我是从1957年就挨过批斗的，小白玉霜、魏荣元虽然平时是主角，政治上也没有问题，但这时仍逃不了，跟我成了一号人。还有一些人是“历史反革命”、“坏分子”等，他们也是一伙，相互照顾。

我自1957年以后，对“运动”有了点认识，运动整的是群众，倒霉受害的也是群众，犯傻的也是群众。

这群被冲击的人也分“正统派”、“改造派”、“死硬派”。当领导的、党员们是走资派，他们自我感觉良好，虽然在一起劳动，一起挨批斗，他们仍自称是“正统派”，大走资派仍使用小走资派。“改造派”是我们这些演员、作者、舞美等业务人员，是没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历史反革命、坏分子是不能改好的“死硬派”。

大打、大抄一阵后，我就被关在单位了。土山上小木工房里、小胡同堆破烂的房里、资料室和排演场边上的小耳房煤屋子等地都关了人。这些人被单独关押，不准相互说话接触。关押了这么多人，还要为这些人准备一批看管人员。两个看管的人在门外看着关押的人，一天三班倒。开始把看管的人也累得够呛，夜里屋中不许关灯睡觉，脸朝窗户不许脸向里面，还得配备男女看管人，因关押的人有男有女。后来我看他们太累了，大都是同事，我跟看管的人说：“你们也闭一会儿眼睛休息休息，我不会出事。你们怕我自杀，把我身上的钥匙、手表都拿走。我没有罪，你如果相信我，可以睡会儿。不然我睡我的，你就站在外边为我站岗吧。”看管我的李萍听了我的话，上班就坐在那里睡一会儿。她说：“凤霞，我还得谢谢你！你唱戏是好角儿好心人，现在被关着也是好心人，我谢谢你。”我常常跟她偷偷地说点话，也无意中得到很多消息。被关着就是闷，李萍和我说几句话可痛快极了。但和李萍一起值班的另一个向领导汇报这件事，我被叫去问：“李萍跟你说了些什么？”我当然咬定一字不说，挨打挨骂、逼审我都忍受了。李萍看见我，她用眼睛暗暗表示感谢我。

开始，我在这群被关的人当中，算是问题最轻的，可以出去买东西，但必须向看管人请假。我还担负了一些任务，每天给大家买早点，给被锁着的人买饭。买早点一天也挺忙活，早晨6点就得出去到锦什坊街早点铺给大家买油条、烧饼。5点大家起床洗漱完毕，因为被关的人不许相互串连说话，5点半都站在院里，把钱交给我，看管的人看着，有要油条的，有要糖油饼的，还有要烧饼、麻花的，我全凭脑子记，可真够麻烦的。早点铺的人都认识我，看见我进去就照顾我先买，他们也知道我是被单位关押着的，也借着我去买早点的机会跟我说点话：“大家都关心你，听说你没有什么事。你可要想开些，有人就是嫉妒。”买回来早点我有个好处，可以

借机放开嗓子喊叫：“早点来了，来呀取早点呀！快呀！”我把早点放在院子当中一个大凳子上喊叫着说：“大伙自己领取自己的一份。”于是人们从四面八方关着的小屋子低着头出来，看管人监视着他们把早点领走。6点半又都出来劳动了，扫院子、生炉子、倒垃圾、搞卫生等等。我替人们买饭，开始随便买好菜。我知道张某爱吃肉，就给她买肉。我为她买的肉放在米饭下面，素菜放在上面，看管的人用筷子捅捅，发现我给她买的是有肉的好菜，就汇报了。结果革委会的头头下了命令：“不准被审查的人买好菜，只给他们吃指定的菜。”这边是批斗打骂我，那边则很多人都骂我，说是我招出来的。有一次，工宣队一个年岁不大的人看见我老是端着两个窝头一碗菜汤，便问：“新风霞，你为什么老吃这一种菜呀？”我说：“这是规定的，不能买别的菜。”这个工人很生气，他说：“这怎么行！受审查，也没有查清定性，吃菜不应当管。”他大声对着饭厅食堂负责人说：“新风霞她们吃菜应当随便买，不能老让她们吃白菜汤。”从此我们吃菜可以随便了，可我们还是不敢常买好菜，我自己更是从没有吃过好菜。

过了一阵，专案组说：“你们的薪金不发了，只给每人生活费12元。”这可困难了，食堂的朴师傅对我们这些关押的人很好，老是给我碗里加点肉片。有一回不知从哪里请一位农民老大娘来剧院忆苦，她也就四五十岁，手里拿着一条大毛巾，讲如何受苦，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比唱戏还像。忆苦会开完，食堂里摆了几桌鸡鸭鱼肉，领导陪着她大吃一顿，这是思甜。可是让我们这些人吃忆苦饭，全是麸子和糠，旁边有人看着，谁不吃批斗谁。我有胃溃疡病，但哪敢不吃，硬是喝口凉水，吃一口，吃下大半碗。吃了麸子皮和糠，连大便都解不下来。胃出了血，吐了满地黑血，还便血，胃疼得昏过去也没人管。演员杜洪昆值班看管我，他说：“凤霞，我做主了，上人民医院，走！”他说着背起我就走。到了人民医院，看病时医生说：“她胃出了血，本应当住院，可她是‘黑五类’，再说也没有病房。”只给了一点药，杜洪昆又把我背回来了。医生要我吃流食，可是造反派不批准，我就是一口也吃不下规定的窝窝头了。朴师傅自己掏腰包，每天给我做流食，冲鸡蛋，做面条汤等等。一个多月我好了，胃也不疼了，接着又是天天顿顿窝窝头了。

过了一阵，又时兴了新花样，毛主席一有“最新指示”，就要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我们被审查的人没有资格上街游行，但要背语录。大都是夜里上街，也是夜里传达毛主席指示，睡得迷迷糊糊被叫起来，“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哎呀！真急死了！记都记不下来，被折腾得也没这份心思，最后挨打，最损的是背不下来的人被推到院里站着受冻！背“老三篇”，我背得很熟，就是三天两头的“最新指示”，死活背不下来。后来，“最新指示”多了，革命同志不愿去了，就让我们去，稀稀拉拉地没等走完，人都散了。白天满街跑宣传车大喇叭，念“最新指示”。人们说“浪费汽油，人人发愁！”最怕的是下雪下雨，最高指示下来了，上街游行，赶上什么天儿也要去，谁又敢说什么呢？

不知道哪里又传来被关着的一个人自杀的消息，对我们又加紧看管了。夜里被叫起来，审问有什么想法。我回答：“我什么想法也没有，只盼着运动过去，我还要上台唱戏。”这可糟了，说我梦想复辟，对我又打又骂。

被关押时最高兴的是劳动。出去劳动，下大雪扫马路。我们单位离全国政协不远，政协里关押的人出来跟我们一起扫马路。可巧我和沈醉、溥仪在一起，溥仪他不会干活，我就替他多扫几下，他感谢我，老说：“谢谢您了。”我怕被别人听见，就对溥仪说：“你别讲话。”他吓得退几步，让过我扫的地方。沈醉会干活，扫得也干净。记得我们去政协帮助劳动，搬家具换房间，打扫挪动。一个长书桌，我和溥仪搬，他很吃力，还不如我的力气大。沈醉偷偷对我说：“他不会干活，平时都是我帮他干，真可怜啊！”后来我多次去政协帮助他们劳改队劳动。

被关押期间，我真是随时盼着运动搞完了，我仍要上台唱戏，审问时我就这么说。因为我说了真话，就批我“要复辟”，挨打，挨骂。关押中，早请示，晚汇报，我每次都是真心实意地

对着毛主席像，流着眼泪痛苦地恨自己忘本变质了。可回头又想恨自己哪点啊？自己从哪方面都是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地工作，规规矩矩地做人。运动就是这样把无数的好人、正常人“运动”得精神失了常！

在关押时，我天天压腿，练腿、腰、胳膊、手，看管的人不许我动，我举小铁马扎，他们就把马扎给没收了，用绳子倒捆着我的手。我就一出戏一出戏地背，他们看见我嘴动了，说我是在咒骂共产党。军宣队的人把我叫去审问，我说要练功，怕在关押期间头脑坏了，身体关节坏了，因此我要练功。军宣队一位年岁大的让我唱练给他看。我认真地唱了两段《刘巧儿》《花为媒》。他说：“汇报说，你已疯了，自己跟自己讲话，神经坏了。”我说：“我没有傻，我就是怕放我出去不能唱戏了，那比关押我还要痛苦。”这位解放军说：“你回去吧，我们听了，你唱得是不错，很好，你会上台的。可不许向他们讲……”我明白这是让我不能讲唱给他听的事。

我在剧院算是人缘好的，有一个青年电工小戴看我手提着暖壶去水房打水，他也提把暖壶去打水。这时正好没人，他小声说：“这是吴伯伯送你的。”说着塞我手里一条手绢，我回小屋，不敢看，一直等到晚上人们都下了班，我才关上门看。是祖光写给我的，因小白玉霜已自杀了，他是怕我想不开。小戴偷偷去中国戏曲研究院找吴祖光，看没有人，祖光交他一条手绢，上面写的是：“风！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一切都会好起来，珍重！”我看了后，心怦怦跳。后来小戴又进了我的专案组，又借审问来找我：“你写个条我给伯伯送去，明早我来，叫你去受审时交给我好了。”

我好紧张啊！一生不敢偷着做事，这回可紧张了，我借写交代写了一个条：“光，我知道一切会好起来！我顶得住，放心！风。”我可能脸上带出紧张的样子来了，被唱三花脸的一个演员看出，我把写完的纸条，放进袜子口里边，因为随时都被检查搜身。我在写条时他已在门缝偷看了，他报告了专案组，这一下子可不得了啦！单位专案组组长带着一群人闯进小屋，七手八脚有人抓住我头发搜了身，从袜子口里找出纸条，念到“我顶得住”时很多人打我、踢我，我已被推打昏了头，在小黑屋的地板上蹲了一夜，我被打得鼻青脸肿。告发我的人不久退休，很多青年骂他台上演丑角，台下也是丑角……

□ 摘自《我叫新风霞》，北京出版社出版

~~~~~

## 【难忘岁月】

### 江青是怎样折腾我拍“样板电影”的

• 严寄洲 •

1963年，广州军区剧作家赵寰，根据1962年台湾当局派出九股武装特务，窜犯大陆沿海骚扰，被大陆英勇的海防民兵一举歼灭的故事，创作了一部多幕话剧《南海长城》。军区战士话剧团演出后，广大群众反应强烈。

1964年，《南海长城》奉调进北京演出，6月19日，毛泽东和江青观看了演出，毛泽东对该剧予以肯定。之后江青又和剧团领导及作者赵寰谈了进一步修改的意见，据她说有的是毛泽东的意见。

196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陈播拟将《南海长城》搬上银幕，并决定由我出任该片导演。此时我正在广东湛江地区拍摄《带兵的人》，巧的是这部影片也是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演

出的同名话剧改编的，编剧是广州军区的作家肖玉。

在这段时间，被人称为“旗手”的江青，先后“呕心沥血”搞出了八个样板戏。不过舞台演出毕竟观众有限，影响面不大。江青一直有想拍“样板电影”的念头。当她获悉八一厂要根据《南海长城》拍成电影，正合她意。为了了解我的导演业务水平，江青在海南岛三亚地区的大东海疗养地调看了我所导演的大部分影片。江青一直对三四十年代在上海电影界与戏剧界的艺术创作人员存有戒心，因为这些人了解她在上海时的老底。而八一厂的创作干部都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老八路，使用起来不怕露了她在上海时那些见不得人的丑闻。

赵寰专程从广州来到北京，把一份江青对话剧《南海长城》的意见交给了陈播厂长，并传达江青指示：同意八一厂把《南海长城》改编成电影，并说剧本由你们自己去改，请严寄洲多多费心吧。

我拍完《带兵的人》返回厂里，接受导演《南海长城》的任务时，同时获悉此片将由江青出任艺术指导，不免心中窃喜。心想，江青懂电影，而且长期在主席身边工作，对我拍摄这部片子，将会有极大的好处。谁知道我的这种天真，到后来却成了可怕的悲剧。

1965年7月19日，江青在中南海的丰泽园召见我们，这儿是毛泽东与中央领导们商议国家大事的地方。这次被召见的有总政文化部陈亚丁副部长、陈播厂长、故事片室主任冯一夫和我，江青一见大家便兴致勃勃地说：“这部戏是毛主席看过的，一定要拍好。”继而又讲了很长时间如何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话（那时还没有发明“三突出”一词），要形象高大，对剧本修改和剧情的安排都要以此为中心……说是座谈讨论，其实是她一个人演讲。

江青参予拍摄《南海长城》，一是想打开拍“样板电影”的局面，但主要的是想借军队这座尊神，帮她通过文艺界走进政界。她对我说：“这些年我是攻来攻去攻不动，看来只有依靠解放军。”

我以最快的速度，突击写出了《南海长城》的“分镜头剧本”，并将“导演阐述”送呈给江青审阅。

过了几天，江青办公室的柴秘书打来电话，说江青要和陈播厂长谈事。以往江青的作风总是恣意行事，今天在电话里却突然讲起了组织纪律性，她说：“我直接找你们谈话，组织手续不太合适。是不是请你们向总政说一下，再开会。最好请军委罗瑞卿，总政哪一位主任一起来谈。”

过了几天，江青发话要讨论我写的分镜头剧本了。这回到丰泽园参加讨论的人除了陈亚丁、陈播、冯一夫和我，还有罗瑞卿总长、总政副主任刘志坚等人。这是讨论我的分镜头剧本规格最高的一次了。

江青看着到会的这些头头脑脑，十分高兴。会上只听她一个人说，没有插嘴的余地。分镜头剧本是供摄制组人员拍摄用的，不搞这行的人看不明白，特别是那些“远、中、近、特、推、拉、摇、跟、渐隐、渐显、叠化”一类术语。“导演阐述”也是供摄制组拍摄中作为依据的蓝图。

江青说了一阵，小陈护士来请她去吃药。江青一走，罗总长皱着眉头对我大声说：“严寄洲呀！你这个本子是怎么搞的？看也看不懂。”抗日战争时期，我就和罗总长熟识，说话很随便，我说：“罗总长，这分镜头剧本是供拍摄时用的，你当然看不懂，你只要把那些术语跳过，单看内容就行了。”



江青服完药回来了，她翻了翻本子问我：“严寄洲！你为什么在‘导演阐述’中提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话？他的表演理论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今后再不允许提这个名字。”我的心一沉，斯氏体系是一门科学，哪有什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分，可是嘴上却没敢说出来。谁知江青还要把这“旨意”印发全国各文艺团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再也不提了，可是表演不沿用斯氏体系又用什么呢？无奈中只好变着法儿，把一出戏、一部电影的“最高任务”改称“终极目的”，把全剧的“贯穿动作”改称“串连线”，把“交流”改称“触电”，令人啼笑皆非。

江青的滔滔大论讲完，罗总长说了几句，他说：“江青同志很懂艺术，她来领导你们工作应当很幸福。不过江青同志呀，你身体不好，有些事你就不用操心，交给我们办好了。”罗总长的讲话，江青还不便顶撞，没再说什么。偏偏陈播厂长也跟着罗总长的话表态：“对，对，有些事情江青同志你就不用管了，我们来办就是了。”江青一听脸一沉，冲着陈播说：“怎么？是你们找我来管的，不要我管，那我就不管算了。”此话一出，弄得大家十分尴尬，会议也就此草草收场。

本来，江青看重的是我这个老八路对她那30年代的历史不知道，便于她指挥和操纵。后来她突然了解到30年代我也在上海，顿生疑虑。一天，她让柴秘书通知八一厂说有事找我去谈，我忙不迭驱车来到丰泽园。见面的时间到了，江青姗姗而来。我问江青：“怎么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呀？”江青笑答：“每次大家来，尽听我一个人说，今天想单独和你谈谈，也听听你的意见么。”接着她随便地问：“严寄洲，自从我头一次见到你，我就有一个疑问，30年代你不是也在上海吗？我好像在上海早就见到过你。”我说：“不，我不认识你。”江青说：“你在上海是哪个文艺团体呢？”我说：“我不是搞文艺的，我在上海世界书局印刷厂当练习生。”江青又问：“你在上海是哪年入的党？”我说：“在上海我还不是党员，只是在党的外围组织。我是1938年到了延安在‘抗大’入的党。”

接下来谈拍摄问题了。其实这开场闲谈，恰恰是她今天谈话的重点，也是她的一块心病。现在一块石头落地了，她的脸上有了更多的笑意。江青首先问我片中的男女主角准备选谁来扮演。我回答：“男主角区英才准备用本厂演员剧团的赵汝平，他曾在《烈火真金》、《碧空雄师》、《英雄坦克手》和《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影片中担任重要角色。女主角阿螺一角则借调‘上影’厂的王蓓担任。”江青皱了皱眉头说：“赵汝平气质倒是不错，像个渔民。但要他扮演区英才，缺少英俊挺拔的气质。”我问：“那你说谁最合适？”她想了想说：“你们厂里那个张勇手行不行？我看过他的《英雄虎胆》、《海鹰》、《赤峰号》，都是你拍的片子，他的形象还可以，不过缺乏渔民的气质，让他到渔村去体验生活。”回到厂里，心想怎么跟赵汝平说呢？我总不能抬出江青来当挡箭牌吧。我只好歉意地找赵汝平谈了此事。赵汝平说：“没什么，角色换人常有的事。”这样张勇手便调到了摄制组。我试拍了他的一场戏后，送给江青审看。江青看完样片摇了摇头发话了：“张勇手渔民气质不行，你还是把赵汝平换回来吧。”首长一句话就是“圣旨”，我只得又找张勇手道歉，换了赵汝平。我心想总算主角确定下来了，可以安心筹备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几天后，江青又打电话来了，她说：“还是换张勇手吧。”我的老天爷呀！我的脑袋几乎要炸了！这样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叫我怎么干呀？谁知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隔了几天，江青又来电话说：“王蓓演阿螺不合适，小家碧玉，没有渔家妇女那种粗犷气质，要换。”我一听又蒙了，怎么办？王蓓是我费了好大劲才从上影借调来的，眼下又没有更合适的人选，心中不免有些怨气。我当即打电话给柴秘书，要他报告江青，要求面谈。很快得到答复，让我去丰泽园。见了江青，我单刀直入：“我认为王蓓还是合适的，我想不出还能找谁。如果你有合适人选，我可以去调来试戏。”江青看出我的情绪说：“既然这样，那就定王蓓吧。”我叮了一句：“定了？”江青扫了我一眼：“看你这个严寄洲！定了！不过你一定要好好排她的戏。当她政治上觉悟之后，拿起枪进入女民兵队列时，那种飒爽英姿一定要表现出来。”我连忙说：“一定，一定！”

江青的作息时间与与众不同。她夜里办公，十点钟起床吃早点，午餐是下午四点。现在已经

过了四点钟了，她邀我共进午餐，谁知道席间她又来花花点子了。她说：“影片作曲要换，换瞿希贤，插曲要马玉涛来唱。还有，摄影要换李文化，他拍的《早春二月》拍得美，有意境。”我心中虽不快，但我认为她对艺术在行，比我站得高看得远，虽然干涉太多，出发点还是为了拍好影片么。

那年头，八一厂只有办公室和各级领导家里才能安装电话，我接电话要到隔四户人家的管理科长家去接。江青打电话每次都在三更半夜，苦了我和那个管理科长不得安生。

李文化是北影厂的摄影师。当时他正在拍摄《煤店新工人》，接到厂里命令立即风风火火赶到八一厂我家里，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把江青点名要他来的事儿说了一遍，他欣然接受了任务。然后我领他去丰泽园见江青，江青一见就说：“李文化！你拍的《早春二月》拍得不错嘛，色彩也很好，画面也可以。不过，你那是为资产阶级拍摄的，现在我要你来为无产阶级拍摄，怎么样？”李文化诚惶诚恐，连连说：“是！是！是！”我很纳闷，一个摄影师根据导演意图，把要拍的内容用摄影机拍下来，哪有什么阶级之分呀？

在试拍阶段，我们使用的是阿克发彩色胶片。这种胶片彩色还原层次差，鲜艳有余，中间色调反映不出来。江青找我说：“每次看样片总觉得色彩不好，不是偏红就是偏黄，你最好把胶片换美国的伊斯曼，拍摄低密度曝光效果特别好。”我说：“每年各厂只能分配到一两部重点片用伊斯曼，我们厂已经没有了。”江青一挥手：“那好吧，胶片问题你别管了。”第二天，罗瑞卿总长突然通知陈播厂长和我到钓鱼台，见了面罗总长说：“昨天晚上，江青同志打电话来，说什么胶片怎么着？你们知道吗？”我连忙说：“江青同志说，现在我们用的胶片不好，要换美国的伊斯曼，厂里没有这种胶片，须用外汇去买。”罗总长说：“你要用多少？”我说：“一万米，一块美金一米，一万美金。”罗总长说：“那好吧，我跟总后说一下，以后这些事你就不用找江青了嘛，找我好了。江青她懂艺术，你要好好听。不过不对的话就不要听嘛。”罗总长的最后一句话，当时我并没有在意，我政治上迟钝，没有领会。

胶片问题解决了，我可以高枕无忧了。谁知半夜三更又来电话了，江青在电话中说：“严寄洲呀！我们拍的是无产阶级的彩色片，演员的皮肤不能像资产阶级少爷小姐那样白皙粉嫩。从明天起，你要让演员都去晒太阳，把皮肤晒得黑红黑红的。”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让演员去晒太阳，遭到化妆师的强烈反对。他们说太阳把皮肤晒暴了皮就没办法化妆了。至于皮肤的颜色完全可以用底子油彩解决。我觉得化妆师说得在理就不吭声了，可是这天半夜里又来电话了，江青问：“演员晒太阳没有？”我支吾地说：“明天开始晒。”第二天我只得让演员都到院子里转了几个圈搪塞。这件事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我抗拒江青指示的一条大罪状。

演员定下来了，作曲家瞿希贤、摄影师李文化也都来报到了。下一个阶段就是由剧作家赵寰带领大家去广东汕尾渔村体验生活。

过了一些日子，我们乘火车到达广州，广州军区文化部一位领导已经等候在月台上，一见到我便说：“总政文化部电话，亚丁部长命你立即返回北京，有要事商量，这是飞机票。”我只得从火车站直奔飞机场飞回北京，在飞机上我心中直嘀咕，肯定是江青又出什么馊点子了。到厂后，我和陈播找到陈亚丁问个究竟。陈亚丁说：“还是阿螺那个角色问题。”我说：“最后确定用王蓓是江青同志点了头拍了板的嘛。”陈亚丁莫可奈何地说：“既然江青同志要换，你就执行算了。”我说：“换谁？江青要换谁我马上去借调试戏。”陈亚丁摇了摇头：“她没说，你是不是试一试田华？”我问：“是不是江青的意见？”陈亚丁说：“不是，是罗总长提的，这样省得你被动。”我对陈播说：“田华现在棚里拍《秘密图纸》的内景，怎么办？张勇手已去南海渔村，

没人跟田华配戏，摄影师李文化也去南海了。”陈播说：“《秘密图纸》可以停拍几天，让王心刚配一下戏，摄影师也临时请《秘密图纸》的摄影师帮个忙，回去我马上通知《秘密图纸》摄制组，你就在他们的内景棚里拍好了。”

拍完了田华和王心刚的一场试戏，等样片一冲洗出来我立即请江青来看。她一连看了两遍，好像已经忘了今天看样片主要是看田华扮演阿螺的戏，开口就说：“你看，王心刚的形象什么角度都好看，区英才就换王心刚吧。”我一听吃了一惊，阿螺的角色还没定下来，怎么又冒出让王心刚把张勇手换下来，我非常气愤，但嘴上却只说：“那阿螺呢？”我在放田华样片同时把王蓓的样片也一块放了，以便有个比较和选择。当时江青反问我：“你看两人谁合适？”我说：“从目前这两个人来说么，王蓓比较合适。”江青想了想，又说：“那好吧，王蓓就王蓓了，你们军队上的事你还得请总长来定。”翌日，罗总长来厂看了样片后问我：“江青同志怎么说的？”我如实汇报说：“江青同志看了两遍样片后问我，两个人谁合适？我说，从目前两个演员来看，还是王蓓合适，她说要你来决定。”罗总长说：“嗨！这个江青同志，她来定就算了么。”我又说：“男主角江青同志确定换王心刚。”罗总长说：“好吧！女主角用王蓓，男主角用王心刚，定了。”角色总算确定了，可是我还得去南海渔村做张勇手的工作，唉！我又重新调整了分镜头剧本，修改中我总是觉得政治性强了，人情味差了。一号人物区英才概念化，缺少戏，所以我重点加强了剧中第二号人物阿螺的戏，这样影片更具人情味和戏剧冲突。谁知江青看后发火了。她狠狠地冲我说：“你这是搞中间人物呀！区英才才是剧中的一号人物，应该突出他的戏，把他写得高大才好。比如他与匪首王中王在悬崖顶上搏斗，王中王纵身跳海逃跑，区英才手中不是拿着匕首吗？他可以把匕首含在嘴里，纵身跳海追击，那画面该多么精彩呀！”我实在按捺不住了，脱口说：“那不行，那么高的悬崖，含刀跳下去，惯性会把他的嘴震豁的。”江青把脸一沉说：“这是艺术真实嘛！”我不便再反驳，心想由你说去，我拍摄时再想点子，你奈我何。为此，“文革”中给我定性是抗拒伟大旗手的“滔天大罪”。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频繁接触，江青那种盛气凌人的作风实在令人难以承受。我心想艺术上的探讨应当是平等的，为什么非要全听她的“一言堂”不可呢？不过我对她的特殊身份还是比较尊重的。而且那个时期江青搞样板戏尚是初露峥嵘，还没有后来在“文革”中那样嚣张狂妄。我则误以为和她在艺术上可以探讨甚至争论，殊不知到“文革”中她会对我下毒手。

1965年冬，我率领摄制组全部拍完外景回到北京。正因为我拍摄的这部电影是江青亲自挂帅的所谓我国第一部“样板电影”，我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努力工作的，自我感觉也良好。返厂后陈播厂长告诉我，江青正在上海开会，要我携带样片到上海请江青审看。我立即飞抵上海，才知道她在上海召开一个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参加会的仅是少数几个部队领导人员，有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宣传部长李曼村、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加上一个上海市委副书记张春桥。他们住在延安饭店，江青住在锦江饭店，每天看国内被点名批判的影片，以批“黑线”为名，把江青的个人意见、观点灌输给与会者。后来把《座谈会纪要》冠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字样，以示这个“纪要”非同一般。

我住进延安饭店，第二天就高高兴兴去给江青审看，江青一连看了两遍样片，紧绷着脸半天没吭声。我心里直打鼓，知道要出问题了。果然，江青开腔了：“这个演阿螺的王蓓根本不合适，没有女民兵那种气质。她是上海30年代的人，要撤换，班子要调整。我让你拍成‘大江东去’那种气概，你却拍成‘小桥流水’。我建议把主创人员都调来，大家一块儿谈谈。”我一听懵了，怎么又蹦出个30年代人物来？噢！我恍然大悟，从开始江青就反对用王蓓演阿螺，那是她自个儿贼人心虚。30年代王蓓在上海，一定知道她的底细，所以反对用王。其实王蓓早年在上海拍《乌鸦与麻雀》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女孩。此外，江青指责我把她要求拍成“大江东去”，拍成了“小桥流水”，此话我从未听她说过呀！以往，只要是她的每次谈话，都要整理成文打印上报和存档的，她从来没说过这话。而且从拍摄的外景样片看，李文化拍得很有气

势，把南海渔村拍得非常优美，富有诗情画意，扯不上什么“小桥流水”。再说，李文化是她亲自点名从北影借调来的。另外，她提出要主创人员来上海，所谓主创人员除了摄影师，全都是剧中扮演正面人物的演员（当然王蓓不在其中），而扮演反面人物的主要演员全没份儿。我心想，在影片中不论扮演好人还是坏人，全都是演员么，为什么演反面人物的演员都没有资格参加呢？我向陈亚丁部长提出这个疑问，回答是：“江青同志怎么指示，你就执行好了。”

人马到齐，江青在锦江饭店召集开会。她说：“样片我看了两遍，心情很沉重。有些问题想和大家商量商量。这部电影，是由话剧改编的，主席和我都看过这出戏。所以一定要把它拍好，拍成‘样板电影’。从现在的样片看，差距还很大，扮演阿螺的王蓓不行，小家碧玉，要换。还有那个扮演女特务‘大光灯’的演员，太漂亮。这是阶级感情问题，你们要重新调整班子，重新去体验生活，和渔民实行‘四同’。外景重拍，怎么样？有信心就拍，没有信心就算了，责任由我来负。”

我听了她这套武断言论颇不以为然，不用王蓓是她的阴暗心理作怪就不去说了，可是说“大光灯”太漂亮更没道理了。剧中“大光灯”使用的是美人计，美人计如果人不美是个丑八怪，那怎么行呢？可江青的话是“金口玉言”，没法扭转。我问：“那这个阿螺换谁来扮演合适呢？”江青想了想说：“祝希娟演《红色娘子军》的琼花不错。还有我最近看了一出歌剧，那女主角也不错，都可以借来试戏么。”圣旨一下，我不敢怠慢，马上派人去商借。一了解情况，祝希娟怀孕四个多月，根本不可能参加拍摄；而那个歌剧演员，由于作风问题，剧院已经准备处理，不可能再借来试戏。江青的建议落空了，怎么办？此时的江青，心中也没个谱。无奈之际，她突然发现我身后站着一个年轻的女演员，这是我从部队文工团借调来扮演片中另一个不太重要角色的，由于她扮演的是“正面人物”，所以有幸前来参加这次接见。江青好像突然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指着那女演员说：“她怎么样？你要培养培养青年演员么。”旁边那位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走到我面前说：“你们这些当导演的，满脑子只有白杨、秦怡。”我当时还不知道他是谁，便说：“我从来没有请白杨、秦怡拍过戏。”此时，江青也不知道哪来一股子邪劲，三脚两步走到我面前，冲着我双腿一并，装模作样地说：“我代表全国的青年演员求求你们啦！培养培养她们吧！我向你鞠躬。”说着她表演似地对我深深鞠了一个90度的躬。又说：“我向你作揖。”说时双手合十向我连连唱喏。我忙说：“我一定试，一定试。”当时我窝在沙发里竟然没有欠身站起来，确实有些不太恭敬，弄得在座的刘志坚副主任、李曼村部长、陈亚丁副部长和演员们目瞪口呆。

闹剧散场了，我小声问陈亚丁，刚才那个说白杨、秦怡的是什么人？陈亚丁告诉我：“他是上海市委文教副书记张春桥。”

后来，江青可能发现对我过于苛刻，于是当着演员们的面和我套近乎。她说：“严寄洲呀！拍完《南海长城》你准备下一部拍什么呀？”我说：“还没考虑。”江青说：“有一部小说《战斗在滹沱河上》不错，还有《欧阳海》里的童年部分也很好么。另外，《三大战役》也应该拍呀。”我脱口而出说：“我年纪大了，准备以后不拍军事题材的影片了。”江青一听话音不对，立刻眉头一皱，两眼一瞪恶狠狠地说：“怎么？你对我有意见呀？有意见我可以不管么。”我连忙解释：“不是的，我实在是觉得年龄大了，拍军事影片有点儿力不从心了。”这件事到了“文革”又列入了我的罪状。

在上海这段时间里，我实在感到头脑发胀，无所适从，根本没法进行艺术创作。江青看出了我的情绪，单独召见我谈话，我连忙赶到锦江饭店，等江青身边工作人员举着温度表测定屋内温度合适了之后，江青姗姗而来，身后跟着柴秘书和小陈护士。落坐之后先是谈了一通她对影片的设想，接着进入正题。她问我：“严寄洲呀！你今年多大了？”我答：“四十九岁。”江青说：“噢，我比你大三岁。”又问：“身体状况怎么样？”我答：“没什么毛病，只是经常有些偏头痛。”江青回头说：“柴秘书，你联系一下，上海哪家医院好，让严寄洲去看看病。”我连忙说：

“不用，现在工作正忙，以后再看吧。谢谢江青同志。”江青又问：“你一个月薪金多少？”我答：“一百七十块。”江青说：“啊，我比你多三十块。够用吗？”我答：“够，我爱人是剪辑师，她也有薪金，足够了。”江青又问：“你家还有什么人？”我答：“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在上海还有一个老母亲，住在我妹妹家，由我抚养。”这次谈话，我还很受感动。其实她是为了稳定我的情绪，好为她的“样板电影”卖力。

不久，根据江青指示，我和摄制组主创人员再去渔村体验生活。就在此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奉命返回北京参加运动。开始我还以为只是开几天会，讨论讨论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谁知道一场大灾难临头了。

“文化大革命”实乃“大革文化命”。八一电影制片厂作为一个文化单位首当其冲，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高音喇叭昼夜不停，各色各样的战斗队组织起来，厂内生产全部停顿。

一天，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见文艺界的“左派”讲话，她在长篇大论中突然冒出一句：“严寄洲这个王八蛋不听话。”这一句话不要紧，八一厂的“左派”们如获至宝，立即专门组织批斗我这个被江青公开点了名的“黑线人物”。大会上把要演员晒太阳奉阴违不执行；宣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当面向江青撂挑子；气得江青向我鞠躬作揖等等，全都端出来上纲上线，“控诉”我的“反革命罪行”。我被强迫坐“喷气式”，又弯腰又搥脑袋，整得喘不过气来。突然我不知道哪来一股劲儿，摔开拽住我的打手，大声喊道：“我能不能说话？”造反派头头以为批斗起作用了，说：“好，你就交待你的黑良心吧。”我说：“王八蛋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江青同志只说了我一句话，凭什么要批斗我？”

沸腾的斗争会一下子好像被泼了一瓢凉水。造反派头头气急败坏地慌忙宣布：“今天严寄洲的态度很坏，滚回去！”

造反派可没有就此罢休，他们继续上报我的所谓“黑材料”，说我把江青30年代的风流事儿到处散布。这可是天大的冤枉，我在上海时经常见小报的“花边新闻”，可是我从来没说过，因为我认为江青是毛主席身边的人。

过了不久，江青又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文艺界造反派的讲话中，突然插上一句：“八一厂那个反革命导演严寄洲抓起来没有？他很坏，他在拍《南海长城》时，在我病中折磨了我整整三个月，我指示一次，他反对一次。”这下可定性了！完了！我一百张嘴也没法说清楚了。

我从1966年7月被揪出后直到1972年6月，批斗、关押、辱骂、毒打、劳改，受尽了折磨达六年之久。1972年6月，我刚回到八一厂，谁知“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1973年1月，江青突然窜到八一厂来，她在全厂大会上讲话中又捎上了我，说：“你们那个导演严寄洲抓起来没有呀？要专他的政。”女皇一声令下，半夜三更一批如虎似狼的喽罗又把我抓了起来，关押在本厂桃园内的一间小工具房内，一直到1974年12月底才放回家中。

□ 原载《炎黄春秋》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 //www. cnd. org /](http://www.cnd.org/)

---